

## 地球周刊 | 封面故事

上接B02

1996年初,28岁的格林瓦尔德决定,他宁愿挑战强权,而非在法庭上保护他们的利益,于是他离开了沃切特利普顿,自己开了家小事务所。不断地被大公司忽视,他在法庭上取得了接连的胜利。他的小公司主要受理宪法和民权相关案件。他花了5年时间捍卫新纳粹分子的第一修正案权利(保证公民的信仰、言论、集会自由)。格林瓦尔德认为这是他律师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时刻之一。“在我看来,无条件地捍卫原则是英勇之举,尤其是当这一原则保护的是你所仇恨的人时。”

然而,法律,即使是最纯粹、最自由派倾向的法律也难以避免不公正的判决。在9·11恐怖袭击后,互联网上涌现的平等主义对话更加令他感兴趣。格林瓦尔德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发现了这个世界。工作中感到烦闷时,他开始查看美联网的留言板,包括一个由传统基金会和《国民评论》创建的保守派论坛。很快,格林瓦尔德就在网上和陌生人开始了激烈的论战。让他更加惊讶的是,他甚至和其中的一两个人成为朋友。于是他认识到,互联网也许是唯一传统规则不适用的地方。“我相信思想的冲突,”他说,“我的观点受到挑战。”这类自由形式的辩论涌现于虚拟世界的同时,却由于9·11后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正在从主流媒体消失。在基地组织的“脏弹客”荷西·帕迪拉被捕后,格林瓦尔德意识到政治文化的大转变。“美国公民在本国被捕,没有指控、不经审判就被监禁多年,并被剥夺请律师的权利,这绝对让人无法接受,”格林瓦尔德说,“相比做法本身,竟然没有任何人质疑这样的做法更让人愤怒。那个时刻,我自问,‘美国到底他X的怎么了?’”

2005年冬,格林瓦尔德到巴西度假,考虑退出律师生涯。假期第二天,他在里约海滩上遇到了正在打沙滩排球的19岁英俊青年米兰达。从此以后,两人形影不离。不久之后,格林瓦尔德决定移居巴西。由于无法继续做律师,他开始尝试写政治博客。格林瓦尔德开博客的第一周,2005年10月,正好碰上副总统切尼的办公室主任斯库特·利比因瓦莱丽·普莱姆间谍身份被泄露一案被起诉。格林瓦尔德写了一篇很长的博文,精妙地驳斥了保守派为利比准备的辩护。《新共和》杂志转载了该文的链接,给他的博客“无主之地”(Unclaimed Territory)带来了数千名读者。很快,格林瓦尔德开始关注NSA,该机构得到布什政府批准,可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对美国公民实施窃听。

2005年12月16日,《纽约时报》一篇文章揭露了NSA的窃听计划。但在布什政府的压力下,《纽约时报》将这篇文章扣押了13个月才刊发。此时布什已经成功获得连任。“这是《纽约时报》的奇耻大辱,它背叛了新闻机构的职责,”格林瓦尔德说,“在那之后,我决定自己来揭露真相和谎言。”

还 有一个人也对《纽约时报》发表窃听新闻的做法感到困扰。他就是爱德华·斯诺登。一位充满爱国热情的年轻人,曾经梦想过当一名间谍。“这些人应该被射掉蛋蛋。”25岁的斯诺登2009年在网络论坛留言,批评泄露消息的人和刊登新闻的报纸。“他们报道的是秘密信息,”他说,“这样的东西绝不该上报纸……这样的做法可以叛国罪论处。”

斯诺登在世界最大情报收集机构NSA的阴影下长大。他家所在的马里兰州克罗夫顿安阿兰德里社区是一个稳固的中产阶级社区,居民2.7万人,曾被《金钱》杂志列为全美100大最适宜居住地区之一。克罗夫顿及其周围的城镇为当地的国防和情报承包商提供了大量劳动力。有着数万名员工的NSA就在15英里之外的米德堡,那里的高中特别开设了“国土安全课”,帮助孩子们进入这一行业。周围几乎所有人都为政府工作或是从事“电脑技术”。

斯诺登的父母都是公务员——他的父亲罗恩在海岸警卫队工作,他的母亲温迪是巴尔的摩美国地区法院的文书。他是一个瘦削安静的孩子,几乎没有给老师和同学留下任何印象。互联网构成了他全部的世界。他经常在技术新闻和文化网站Ars Technica上用网名TheTrueHOOHA发表帖子。他谈论游戏、请教电脑技巧。“我真的想要知道网络服务器的工作原理,”18岁时他发布了这样一个问题。偶尔他也涉猎人生哲学:“自由并非一个可以随便定义的词。”他写道:“有人说,‘不自由,毋宁死,’对此我深信不疑。这似乎暗示自由是幸福的必要条件”。

虽然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一个绝对聪明的孩子,但斯诺登的学习成绩很一般,中学10年级就辍学。在那之后,他断断续续地读了几年社区大学,却没有拿到正式文凭。这个时期,他大量的时间泡在网上,大玩格斗游戏,剩下的时间到处闲逛,思考自己要做什么。“我一直梦想着在日本大获成功,”他2002年在网上聊天时说,“有调查显示,金发的人在那里比较容易找工作。我不介意在那里找份收入不错的政府工作。”但通向成功的道路似乎迷雾笼罩。20岁时,他在一篇帖子中说,在这个NSA主宰的地方,“既无文凭也没有安全许可,几乎注定失业”。

像布拉德利·曼宁一样,斯诺登对美国及其在世界中的角色有一种理想化的看法。像热衷游戏的人一样,他对

自己侥幸成功的几率充满信心。他后来告诉格林瓦尔德,他的道德观很大程度上受童年时玩的游戏影响。在游戏里,普通人对抗强大的貌似坚不可摧的敌人,总是能够获得胜利。类似思想,加上9·11的深刻影响,斯诺登2004年参加了美国陆军,希望加入特种部队,奔赴伊拉克战场。“我相信我们是在做好事,”他说,“我认为解放被压迫的人们,这个动机是高尚的。”但是,他很快就认识到自己的幼稚——“那些训练我们的教官一心想去杀死阿拉伯人,而不是解放任何人。”在本宁堡训练了几个月后,斯诺登摔断了两条腿,被迫放弃从军之梦。

回到马里兰州,斯诺登在马里兰州大学高级语言研究中心(一家国防部资助机构)担任保安。同时他又回到安阿兰德里社区大学,并不断磨练电脑技巧。2006年,他成为中情局电脑技术员。中情局充满特权和神秘气氛,是美国政府机构中的精英。斯诺登说,IT职业的妙处在于它奉行平等主义。“没有人在乎你读的是什么学校。我甚至没有高中文凭,”他在2006年写道,“因此,我没有欠下学生贷款,年收入7万美元。不久前我刚拒绝了年收入8.3万和18万美元的职位。公司争相招募我。我才22岁。”

2007年,他被派遣到中情局日内瓦工作站。当时同样被派驻日内瓦的年轻法律实习生马瓦尼·安德森和斯诺登成为朋友。据她形容,他是一个体贴但缺乏安全感的人。“他经常谈到自己没有读完高中,但他是个IT天才。”

在中情局的所见所闻让斯诺登越来越不安。他后来提到有一次为了招募一名瑞士银行家,中情局以醉驾的罪名将其逮捕。他还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提到一个被他挑战权威的上司对他的报复。这一事件源于斯诺登在中情局软件中发现了一个错误,并告知上司。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得到表扬,相反,一位经理在他的档案上记了一笔,封杀了他升职的机会。斯诺登最终因为“良知危机”离开了中情局。但他也学到宝贵的一课。他告诉《纽约时报》记者莱森:“尝试顺应体制,只会招致惩罚。”

当 斯诺登学习美国情报世界的复杂规则时,格林瓦尔德继续抨击布什政府及其政策,并指责民主党主宰的国会拒绝从伊拉克撤军。在奥巴马当选后,格林瓦尔德宣称将对新总统同样苛刻,这让他得罪了很多从前的自由派同盟。他对于奥巴马的“只向前不向后看”政策尤其不满。这等于赦免了很多在布什年代犯错误的官员,然而,司法部却开始穷追不舍地起诉泄露国家安全秘密者。这种双重标准在前NSA官员托马斯·德雷克的案件中尤其明显。德雷克在泄密者圈子中颇有名气,他向国会提供了后9·11时期情报计划的信息,并向《巴尔的摩太阳报》揭露了NSA内部的管理不善,包括昂贵的破产计划“拓荒者”。2010那年,他被起诉,罪名是:违反《反间谍法》,错误处理秘密信息。虽然政府的控诉最终不了了之,但法律官司却让他失去了工作,用光了储蓄,名誉扫地。今天,他在马里兰州一家苹果零售店工作。对于格林瓦尔德和斯诺登,德雷克的遭遇不亚于一种警告。

我在他律师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德雷克。他是一个高大、给人压迫感的男子,真诚却又愤世嫉俗,像个理想幻灭的童子军。曾经担任海军情报官,退役后,德雷克又做了12年的私人承包商,主要工作是系统软件测试。2001年,他受雇于NSA被分配到信号情报部。这是新任局长迈克尔·海登的举措,目的是“搅动NSA的基因库”,使这个冷战时代的机构更适应21世纪。虽然,在密码学和电子窃听等领域,NSA曾经领先世界,但苏联解体后,它的资金被大幅削减,失去了明确目标。老化的管理层未能预见光纤和移动通信技术对世界的影响力,导致NSA濒临“失明、失聪、变痴呆”的危险。德雷克说,它根本没有意识到互联网的重要性,“老家伙们认为,互联网上的东西都一文不值,因为它们是公开的。他们只想知道贴着绝密标签的东西”。

德雷克到米德堡的第一天就碰上9·11,历史从此改变。德雷克说改变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个改变是:随着NSA“摆脱宪法束缚”,谍报能力的大幅扩张,开始监控美国和外国公民。第二个改变是NSA本身的迅速扩张。“9·11后,大量资金涌入NSA,国会基本上等于说,‘你想要多少?’”几乎所有参与追踪恐怖分子的情报机构都在叫嚣“信号情报”。NSA在得克萨斯、乔治亚、夏威夷、科罗拉多和犹他州及海外设立了监听站,并在米德堡大兴土木,今天的NSA总部占地5000公顷,几乎相当于五角大楼的10倍。到2013年,据《华盛顿邮报》报道,NSA的雇员增加了1/3,达到3.3万。同一时期,它雇佣的私人承包商数量翻了3倍不止。很快,感谢资金的涌入和对私人承包商的日益依赖,美国情报设施的核心工作被外包给承包商们。

2 009年,斯诺登离开中情局,NSA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和中情局老板不同,这里欢迎主动解决问题的态度。“NSA的文化很蓝领,比中情局更实际,”德雷克说,“如果你能证明自己的电脑技能,你的背景或文凭并不重要。在NSA,有很多像斯诺登一样的



聪明的斯诺登学习成绩却很一般,中学10年级就辍学。之后,他断断续续地读了几年社区大学,但没有拿到正式文凭。

人,不少是我雇佣的。”

一开始,斯诺登担任戴尔的承包商。戴尔与NSA签订了多笔大合同,负责维护内部IT网络。斯诺登还将为超级承包商博思艾伦汉密尔顿工作。去年,该公司仅靠政府合同就赚到57.6亿美元,几乎参与了情报监控的方方面面。

在NSA的世界里,受雇于政府和私人公司几乎没有差别。唯一差异巨大的是两个迥然不同的群体,一边是保守的传统管理者,另一边是不修边幅的黑客和IT天才,后者构成了主要的工作大军。“这是个奇怪的世界——走廊上来来往往都是年轻人,你永远不知道他们的头发会被染成什么颜色。”在NSA工作了40年,2011年才退休的理查德·乔治说。2000年后他负责监管NSA的信息安全部,招募了大批年轻黑客。“他们有我们这些老人所缺乏的想法,我们需要依靠他们。”

在一些情报圈内人士看来,这些想法也让他们构成危险。“最初时大家曾讨论过,‘如果雇佣黑客,怎样才能知道他们是好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技术与公共政策计划主任詹姆斯·刘易斯说,“真正的问题在于代沟。NSA本来奉行壁垒文化,突然你从外面带来这些孩子,他们对于情报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

当斯诺登加入NSA雇员大军时,他后来将要揭露的监控计划已经发展成大生意。“大约在2009年或2010年,”德雷克说,“很多人借机大发横财。”这套系统却并非没有内在问题。“当你雇佣外部承包商从事政府工作,就需要各种授权文件。”文件以破纪录的速度快速堆积。过去,秘密文件都被放在特殊保险箱里,只有少数几个人才接触得到,现在文件数字化,放入电子档案库,里面包含了所有国家安全信息。

斯诺登在日本开始了他的NSA生涯,在那里,他的工作很普通——监督NSA电脑系统的升级。后来他回到美国,被派往夏威夷,担任系统管理员,最终成为构架工程师,隶属瓦胡岛上的NSA特殊威胁行动中心(NTOC)。虽然他并非精英黑客,却掌握着打开绝密电脑网络的钥匙,还可能负责为未来的网络冲突拟定目标名单,寻找进入外国网络的电子后门。简单地讲,他能接触到其他人接触不到的东西。

斯诺登说,在中情局工作时,他就考虑过泄露政府秘密,但因为不想伤及前线特工,最后放弃了,并希望奥巴马能够改革体制。他的乐观主义并没有持续很久。“我看着奥巴马变本加厉地推行那些政策,”他后来说,“我更坚信了信心。”斯诺登接触NSA的内幕越多,越能读到更多“真实信息”,包括一份2009年的检察官报告,其中详细描述了布什时代的非法监控计划,他更加意识到事实上有两个美国政府:一个是民